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

胡雪琪

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提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是博物馆里陈列在展柜中的精美文物，或许是纪录片中考古工作者在古遗址里忙碌的身影。但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绝不仅仅是对文物的发掘与研究。通过发掘出土的实物，我们能够确证中华历史、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变迁，解读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让我们的文化自信更踏实、更鲜明。

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联袂编写，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考古遗址，向我们展示了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这本书已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4年江苏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书中收录了2012—2023年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共120个考古项目，是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成就的系统总结。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简称“十大”）推介活动始于1991年，一年一度，是中国考古界最具影响力的活动。推介活动在坚持学术标准和考古发掘科学性、真实性、严肃性的基础上，关注考古文物知识的普及、宣传与推广。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等一系列学术意义重大、备受社会关注的遗址，最初都是通过“十大”推介活动进入大众视野。12年“十大”，120个考古发现，见证了中国考古学12年来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这些遗址在年代上跨越百万年，地域上涵盖了中原与边疆地区，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与对外交流的生动案例。

搜集整理120个项目的资料，已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更加可贵的是，《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并没有简单地将项目资料按推介年份罗列汇编，而是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到大部分人对中国古代史的认知以及阅读和资料检索习惯，将所有项目按遗址年代顺序重新编排。全书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六个部分，对哪个时间段的考古与历史文化感兴趣，就可以“按图索骥”，迅速查找、阅读。此外，每个部分还约请相关研究方向的著名考古专家，如陈星灿、雷兴山、杭侃等撰写导读文章，概述这一时段的考古发现与前沿研究情况，更有提纲挈领的效果。在阅读文章的同时，我们也能从字里行间约略窥见先生们的治学特色和学术侧重点。

具体到各个项目上，《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在简明扼要叙述发掘概况、成果、学术价值与意义的同时，加入了大量插图。考古学是“一图胜千言”的学科，一些单纯依靠文字阐释很难理解的概念和术语，在见到实物或者相关图片后，就会豁然开朗。例如，“地层”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没有相关知识基础的读者，很难理解地下为什么会分“层”，不同的地层又如何划分。书中收入了很多实地拍摄的遗址剖面照片，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了不同地层的土质、土色差别，对地层有了感性的认识。每个项目的考古现场工作照，更能帮助读者体会考古人的工作状态和近年来中国考古的发展，认识到考古并不是挖宝，而是科学研究。显微镜下的陶片、对出土的骨骼化石进行现场加固、参与水下考古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正在海底提取文物的柔性机械手……反映先进发掘研究技术的图片大批亮相，辅以发掘出土的精美文物图，让全书充满了考古“现场感”，有效提升了阅读兴趣，达到了普及考古知识的目的。不知不觉间，读者就加深了对中国考古学的了解，对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也有了新的体悟。

有人认为，考古是枯燥烦琐的，是经年累月地“坐冷板凳”；有人认为，考古是浪漫的，可以在广阔的田野中“与古人对话”，探索历史的奥秘；有人认为，考古更像一场刺激的探险活动，其魅力在于发现……但无论你怎样看待考古，在翻开《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后，相信你都会对这门学科产生新的、更加立体的认知。考古，固然有严肃乏味之处，但它包含的，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好奇与探索。它解读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传递着这一延续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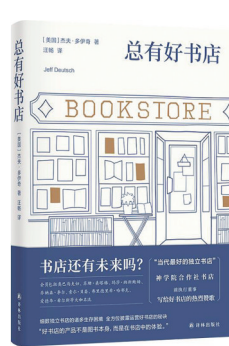
一家书店的六十年史诗

张露

技术理性与生态伦理的张力

张田勘

读《总有书店》



杰夫·多伊奇著
汪畅译

2025年凤凰好书1-2月榜
译林出版社

1961年，美国芝加哥的5名大学生在地下室成立了一家书店。其初衷是为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神学院及附近的学生、教职工提供专业书籍。

如今，这家曾经位于地下室的书店聚集了各种年龄和不同背景的热情读者，它是让苏珊·桑塔格、玛莎·纳斯鲍姆、斯拉沃热·齐泽克、扎迪·史密斯、爱德华·希尔斯等人都为之着迷的书店。它就是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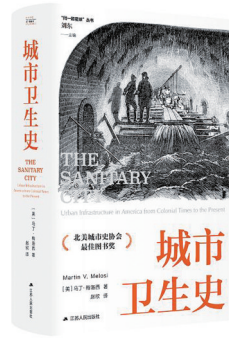
《总有书店》的作者杰夫·多伊奇是继杰克·塞拉后的第二任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经理，被誉为“献身于书店的灵魂”。从2014年到2024年，他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服务了整整10年。他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成功归结于颇具格调的选书品位和丰富的藏书，为浏览和思考而打造的沉浸式空间，为读者创造的沉浸于书店的慢时光，以及打造将成员精神联结在一起的社区。

在多伊奇看来，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之处，或许更是独特之处。

当亚马逊等电商用亏本售书引流、算法精准投喂书单，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却像一位固执的老派绅士，坚持用“低效”对抗这个时代，坚持“以一种对待文物的方式耐心出售图书”，为每本书找到它的读者。

2019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售出的2.8万本书中，有近1.7万本是以单本的形式销售的。也就是说，这1.7万本书中的每一本都为了一位独特的读者所寻求。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和他们的读者欣然拥抱了书店的低效之处。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

为维持运营，杰夫·多伊奇大胆地选择了另



马丁·梅洛西著
赵欣译

2025年凤凰好书1-2月榜
江苏人民出版社

健康的饮用水、完善的下水道设计以及随处可见的干净街道，是城市必备的卫生基础设施。实际上，这些服务是城市建设者几百年努力的结果。日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卫生史》详细阐述了这一历程。作者马丁·梅洛西是环境史、能源史、公众史学等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城市受到英国公共卫生领袖埃德温·查德威克提出的卫生理念的影响。这些城市在1830到1880年间经历了首次重大的卫生观念的觉醒——建造洁净用水的输送系统和高效的排污系统。在此之前，由于没有洁净的供水和排污系统，这些地方霍乱、黄热病、伤寒、结核病等频频发生和广泛传播，发病率和致死率极高。

随着自来水系统在美国城市变得越来越普遍，老式的旱厕系统开始失灵。1880年，约1/3的城市家庭使用抽水马桶，但由于用水量迅速增加，淹没了粪坑和旱厕，污水横流，产生了重大的健康危害。

因此，自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些城市开始兴建排污系统，这期间共有11个城市完成了这项工作，最后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都显著减少了。该书阐述的这些史实表明，建立清洁的供水系统和有效的排污系统是城市卫生的基础，也是城市人健康生活的保障设施。

本书第二部分细菌学的革命主要探讨了20

一条道路：摒弃传统的低买高卖的零售模式，而从礼物经济中获得资金，用图书之外的商品，诸如咖啡、笔记本、贺卡，以支持利润微薄且销售缓慢的图书销售事业。

好书店的标准是什么？多伊奇说：“好书店虽然销售图书，它的主要产品是‘浏览的体验’。”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产品就是空间本身，正是书籍塑造了浏览的空间。

现如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早已不再是一个合作社，也不再位于地下室，搬迁到了芝加哥57街。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在设计新的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时，复刻了老书店的“迷失”美学。他设计了一系列“象征性空洞”，其多边形组合排列的方式构成了一座迷宫；这些人形空洞的“窗口”，诱惑着顾客走进下一个空间。泰格曼说：“所需要的是，随处可读的书籍。”

斯坦利·泰格曼构建了内部结构，而书商规划了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书籍分类。书商的分类法往往构成了书店身份的一部分，如何整理藏书则决定了浏览的逻辑性和意外性。

通过巧妙的书架陈列和别出心裁的书籍分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打造了书籍的迷宫世界。每一本书最初都是凭借其在书海中的位置被发现，接着与其他书籍分离，最后被单独阅读；所有书籍只有通过与其他书籍的关联，才能真正被读者发现。由此，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创造了一个互相联结的书籍世界。

无怪乎《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充满了改变生活的惊喜和未知的宝藏；每当你转过一个角落，你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新发现。”

据杰克·塞拉回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昌德拉塞卡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几个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神学院合作社店门前的草地。

书店的困境绝非数字时代的独有产物。早在18世纪，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便哀叹“图书业每况愈下，图书销售不再盈利”。自那以后，对书店的哀叹从未停息。多伊奇认为，人们对理想图书业的怀旧之情很可能是凭空虚构的，“好书店从没有商业上有所建树”。

也正因此，这部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运营自白，更多的是多伊奇写给好书店们的深情赞歌，更是写给所有“纸质书遗民”的告白。在一键购物时代，在纸质书式微时代，书店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实现其最高愿景——通过好书店的力量，提供条件，让读者放缓步伐，看到更广阔的视野。

世纪前几十年的综合城市系统、管理新技术，以及有关细菌学的新研究和发现，它们对公共卫生思想以及技术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科学新发现的促进下，城市卫生的专业化规模逐步形成，与当时的城市规划以及景观建设发展同步。

本书更有价值的地方是第三部分有关新生态时代的发展及产生的问题。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处理中心城市与郊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卫生和环境问题成为艰巨的任务，这涉及如何处理城市化不断扩大带来的污水排泄、固体垃圾处理，以及如何避免“以邻为壑”——将污水和固体垃圾向别的城市 and 下水道倾倒等问题。而更深远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如何避免以江河湖海为壑，把所有的垃圾和污水排向海洋。

在这个过程中，新理念与伦理问题自然被引入讨论中，环境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受到关注，即环境不只是人独有，也为其他生物共有。人类处理城市垃圾和建设卫生城市，不是把自然当作排泄场，而是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城市卫生史》写道，进入生态时代，一方面要解决污水溢流，最常用的方式是改建卫生下水道；另一方面，处理日益增多的固体垃圾。这有两种方式，一是填埋，二是焚烧。但20世纪50年代焚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间歇式配料御渣的焚烧炉被连续加料、机械加料、连续除灰的焚烧炉所取代。然而，焚烧能否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解决城市垃圾问题，以及避免污染，直到今天都还在探讨。当然，还有一个越发棘手的问题，即随着固体垃圾数量持续攀升，可用于填埋的土地资源日益匮乏。

从19世纪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供水设施、泵站、过滤和处理设施、焚烧炉和垃圾填埋场等，为建设卫生城市和保障城市居民的健康作出了贡献，这些设施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建设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技术处理的物质是污染源，它们经常从一个地方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被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虽然本书并未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和具体方案，但是提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新的科技手段，也需要制度设计。